

遠去的歲月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远去的岁月

王砚
◎著

清

沈志华教授

李丹董教授

指正

王砚

二〇一五年
于北京

远去的岁月

作 者：王 砚

编辑出版：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联系电话：010-68920114 13693651386

网 址：www.grcsw.com

开 本：850×1168 1/16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王 砚



“波兰功勋骑士十字勋章”证书（有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签字）



波驻华大使为我授勋

感言（代序）

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已经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人老了往往会回忆一些事情。有的是一件特别值得思念的事，有的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有的事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总之，回忆是各式各样的。

这几年陆续收到一些老同志、老朋友赠阅的回忆录。读来感到挺有意思，也激发了我将一些往事写出来的想法。有时和年轻人聊天谈到过去的事，他们也会说：“这事挺有意思，你把它写出来多好！”就在这些影响下我有空时也就有了动笔的想法。有时坐下来写上几笔，一年多来居然有了十多万字。自己看了觉得留下这些记忆中的东西给后来者看看，也许有的人会有兴趣的。因此决定将这些东西汇集起来，凑成一本书，就把它称作《远去的岁月》吧！

目录

成年之前	(1931.5—1949.5)	1
第一章	在西安团市委工作时期 (1949.8—1952.10)	7
第二章	在留苏预备部时期 (1952.10—1953.8)	15
第三章	在波兰留学时期 (1953.8—1957.1)	22
第四章	第一次在驻波使馆工作时期 (1956年冬—1957年10月)	31
第五章	第一次在苏欧司工作时期 (1957.10—1962.1)	40
第六章	第二次在驻波兰使馆工作时期 (1962.1—1967.6)	64
第七章	从干校调回及第二次在苏欧司工作时期 (1972.1—1974.10)	79
第八章	第三次在驻波使馆工作 及在外交学院英语专修科学习时期 (1974.10—1982.6)	88
第九章	第三次到苏欧司工作(含被借到对外友协工作) (1982.9—1987.5)	99

第 十 章	第四次到驻波使馆工作 (1987. 5—1991. 8)	112
第十一章	离休之后 (1992. 4—2013. 12)	131
附 录		148
一、我在波兰当留学生		149
二、老翻译的幸福回忆		158
1. 给毛主席做翻译		159
2. 给周总理做翻译		161
3. 给其他领导人做翻译		163
三、波兰的教训		166
四、我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一段经历		173
五、外事工作中遇到的几则趣事		177
1. 原来外国也有“碎碎平安”的习俗		177
2. 关于宗教的笑话		178
3. 认错人引起的笑话		179
4. 小兵被错当做“大官”		180
5. 没有被觉察的“外国人”		181
6. 只“闻其声”闹出的笑话		182
六、中波建交 55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我的回顾		184
七、中波建交 6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我的感想		188
八、我的翻译生涯		193

九、译海浪花-----	204
1. 领导也为我当翻译 -----	204
2. 迄今在任何地方都还未“曝光”的秘密 -----	206
3. 我听到了外宾的“私房话” -----	207
4. 开玩笑也是一门艺术 -----	208
5. 举世无双的展品 -----	209
6. 初识汽车收藏家 -----	209
7. 我是一个不懂音乐的翻译 -----	210
8. 波兰人喜欢“战争”吗？ -----	212
十、我所知道的国际主义战士傅拉托 -----	213
1. 为支援抗战来到中国 -----	214
2. 为增进中波友谊再次来华 -----	216
岁月留痕 -----	219

成年之前

(1931.5—1949.5)

我出生于1931年阴历四月初八（阳历为5月24日）。多少年后我才知道，这一天也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香港等地被称为佛诞日，和12月25日耶稣生日的圣诞节享有同等待遇，是属于公共假日，要正式放假的。

我出生在太原市，但填籍贯时要求填祖籍，我就得写上山西省清源县东青堆村。这个清源县在解放后不久就和邻县徐沟县合并成为清徐县。现在则划归太原市，成为太原市清徐县。清源县虽然不大，但那里生产的老陈醋是最好的，全国闻名。因此在旅游事业发展起来后就被称为“醋都”，以吸引游客。当地也出产很好的紫色葡萄，据说这都是由于那里的水好。

我的名字叫王砚。多次听父母亲说起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据说当时的考虑有三个方面：第一，从我父亲那一辈上起名字的规律是三个字中都有一个钟字，第三个字则各有特色。我父亲用的是“文”字，所以我们姐妹们都与“文”有关，姐姐叫王韵，妹妹叫王琴、王书。我就取了个“砚”字。第二，我出生的那年是民国二十年，二十又按“廿”音念，在山西话里与“砚”字同音，因此当时也有这个考虑。第三，父亲有个挚友在当时前后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张墨，因此就给我取名王砚。

这个取名字的过程和想法还是挺有意思的。几十年后当我向一位波兰朋友谈到这事时，他一方面有点不太理解，一方面又觉得十分新鲜。因为在他们那些天主教国家里，名字都是按教会里的日历固定的，在某一天就只有那个固定的名字，如约翰或者亨利。例如我的一位波兰同学他们家三代人，即祖父、父亲和他都叫约翰。

由于爸爸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太原师范执教，所以我出生时我们家就在太原师范的教职员宿舍里。妈妈曾毕业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在小学里任教，但时间不长，和爸爸结婚后不久怀上了姐姐，就不再工作了。姐姐长我两岁，所以妈妈忙完了姐姐就开始忙我，家里就得请人帮忙（当时都称佣人）。有一段时期二姑从老家来到太原住在我们家，同时照顾姐姐和我，因此我们和二姑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由于妈妈是女师毕业的，懂得幼儿教育，因此我和姐姐都没有去上幼稚园（现在叫幼儿园）。但当姐姐六岁要开始上小学了，我就也闹着要上学，所以当姐姐去上二年级时就把我带上去读一年级。这样我在五岁时就开始上小学了，比现在的规定至少早了一年。当然如果允许按虚岁算，我也可以说是六岁入学的。

由于有妈妈这么好的“家庭教师”，所以我在学习上沾了不少光。在一年级时就闹着要写日记，还要交给老师看。听妈妈说，我比较用心，也有想象力。有一次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灵机一动，写道：“今天下雨，房檐上流下来的水滴答滴答，好像小便一样。”交给老师后，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并把它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叫做“贴堂”，是一种表扬的方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太原也开始人心惶惶。这时爸爸已经不在太原师范教书了。他担任着山西省理化实验所的所长，首先考虑的是把那个单位搬迁到哪里去，也就顾不了我们上学的事了。于是先把我们送到老家乡下去住了两个月，后来实验所已经做好了迁往陕西的准备，就让我们和单位一起搬往山西南部，准备过风陵渡然后再分路走，单位去陕西关中找个什么地方，而我们则由潼关向东到了郑州，然后又沿平汉路到了汉口，再转乘轮船经宜昌到重庆。我们的目的地是成都，因为二叔从小跟着别的“晋商”下四川，在成都作“顶身入股”的店员，那时他已经熬到了那个商店的“三掌柜”。从重庆到成都当时的公路很差，汽车也是那种烧木炭的卡车。现在只用几小时的路程，

我们当时走了两天，中途在内江过了一夜。到成都后和几家山西老乡合租了一个院子住下来，已经是1938年年初了。由于半年多的时间里都在“逃难”，没有学习的时间，因此安顿下来以后就由妈妈给我和姐姐补习功课，然后到秋季开学时我们就去考设在少城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内的成都市立第一小学。为了互相照顾，我和姐姐同时报考了三年级，录取后我们就一起去上学了。

在成都上学的一年里，成都遭到了几次轰炸，同时二叔也病故了。于是我们就和那几家同乡一起迁往成都附近的崇庆县（现在叫崇州市）。我们先是上了一个离家比较近的东城小学，上完了四年级以后又转到一所比较好一点的中城小学。中城小学设在古色古香的原贡院内，老师的教学水平也比东城小学好一些。由于有着妈妈当“家教”的好条件，我在上完五年级以后就试着去报考该县当时比较好的县立中学（县里另有两所私立中学，教学水平都比不上县立中学）。当时的习惯是，考试结果要在学校门前张榜公布，而且名单是按成绩好坏排顺序的，我居然被录取在一百名学生中的第十八名，让小学校长也十分高兴。当时我和妈妈只是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成绩，并不想上中学，所以开学后就进入六年级上课。这时爸爸要我们迁到陕西城固去：一是因为他所在的单位当时在那里，同时那里有着全国有名的中学，原北京师大附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原北京师范大学由北京迁往陕西，先在西安停留了一下，后来就搬到城固县，改名为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也就随着迁到城固，名字虽然改了，但老师们还是原来北京的，因此教学水平仍然保持着全国名校的水平）。我们是在1941年秋由四川迁到城固县的，那时家住在城固县郊外的关王堡村（村中有一座关帝庙因此得名）。由于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爸爸通过老同学的关系把我和姐姐送到汉中县的“西北儿童教养院”，那里是收容流亡难童的地方，管吃管住还管教育。由于院长也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所以他请的教师水平也较高。我和姐姐在那里上完六年级，在1942年夏分别考入西北师范学院附中和国立第七中学。姐姐上的“七中”也是专为流亡

青年设的中学，也是公费学校（管吃管住，不收费），这样我和姐姐都吃“公费”，家里的负担就比较轻些，使我们都能顺利地完成中学的学业。

我考入的“西北师院附中”当时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学制，设想把初中和高中连接起来，因此叫做“六年一贯制”。这个试验是从1941年开始的，所以当我在1942年考入时是这种试验的第二届。因此在班级上我们就叫做“六年一贯制第二班”。但是因为刚开始试验，所以在课程的设置上和其他班级也没有什么不同。我在这个班里上了三年到1945年夏。按平常的规律应该是初中毕业，但我们是一贯制，没有毕业问题，只等着上四年级就是了。



小学毕业照（1942年）

但是当时为了发展西北地区的教育事业，西北师范学院被迁往兰州。于是该院的附中当然也得随之迁往兰州。爸爸妈妈怕我年纪还小，一个人跑那么远无法照顾，有些不放心的，不同意我随校迁往兰州。而就在这时由于河南又沦陷了一大块地方，原来设在那里的“国立第一中学”避难来到了城固，正好接收了原西北师院附中的校址。于是经过交涉，我们一些原来附中的学生就免试转入了“国立一中”。

暑假里，八月份的一天，我们全家正在关王堡村的家中吃早饭，忽然驻在村里的部队营房里响起了一串串鞭炮声，我们很奇怪，我赶忙出去看。那些士兵们说，“昨天日本投降了。”我和爸爸立即吃完早饭，赶紧往县城里跑。因为只有到县城才能看到报纸，也能多听到一些讯息。在县城里见到的熟人们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终于抗战胜利了，可以考虑回老家的事了等等。不久后县城召开了庆祝大会，还举行了晚上的提灯游行。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八月底，我开始了在“国立一中”高中第28班的学习生活。高中三年好像很平淡地就过去了。到快毕业时就要考虑到什么地方去继续

学业的事。按照我家当时的条件，只能考虑到西安去考大学。为此爸爸写了许多信，请熟悉的朋友们能为我提供一些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两处：一处是原来在太原师范就很熟悉的一家，他家里正好有人在西北工学院分院（设在西安）工作，可以为我提供住处；另外一位是西北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是爸爸的好朋友。他在教学的同时还在西安开设了一家私人医院并设有病房。爸爸认为万一有个病痛，总得找个熟人才行。于是我就带着这些“介绍信”去找了他们。我印象里妈妈最初还有点不同意给这个医生伯伯写信，但事后证明，这封信是绝对需要的。

我在西安考试期间突然发病，上吐下泻还发高烧，赶快送到那所私人医院，经诊断是伤寒，结果在那里住了近一个月才算好了些，但忽然又得了疟疾，而且不是那种定时的发冷发热。而这时那位医生伯伯正要迁往贵阳，于是只好把我转送到他授课的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去。在那里诊断是一种恶性疟疾，它的冷热发作是不定时的，但经过教授们的医治，住了几个星期医院也就好了（这个医院离表姐郭象贞家很近，因此我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两场病好了时，已经是十月下半月了，赶快到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去报到。我当时考试的成绩很不好，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只好报考了师专，因为师范学校总是要管吃管住的。入学后上了一个多月课就快要放寒假了。爸爸妈妈认为我大病一场，究竟恢复得怎样？一定要我回城固一趟，让他们看看。尽管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但我还是回了一趟城固。爸爸妈妈看到我恢复得不错，也就放心了。在家里过了春节就又回到西安。当时根本没想到我回到西安后才过了两个多月，西安就解放了。而因为隔着秦岭，陕南直到1949年底才得到解放，所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和家里无法联系。也就是这样我才自作主张中断了学业，毅然参加了工作（虽然由于师专后来被并入西北大学成为教育系，爸爸妈妈觉得我未能继续完成大学的学业有点令人惋惜）。等到陕南获得解放，我和家里联系上时，我已参加工作半年，木已成舟，

爸爸妈妈也就无法再说什么了。

总之，到 1949 年夏，我已年满十八周岁，成为一个成年人。我结束了学生生活。我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学毕业照（1948 年）

第一章

在西安团市委工作时期

(1949.8—1952.10)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我当时正在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简称师专）学习。在面临解放的时候曾有过一个是留在西安迎接解放还是回到陕南去和全家在一起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我曾回到陕西城固去和全家一起度寒假，当时没有谈到过面临解放该怎么办的问题）。当时在西安我只有一个亲属，即表姐郭象贞一家。他们当然无法为我做什么决定。姐夫武树业倒是很慷慨地表示过，如果要回城固需要路费（当时是指从西安到汉中的飞机票，而机票的价钱当然是很高的），他们可以帮忙。我心里知道他们能讲这样的话当然是一番好意，但以我们家里当时的情况显然是负担不起这一笔钱的，怎么可以考虑一笔只借不还的债务呢？当时在西安我有一些比较熟的同学，其中一位叫夏振亚，我们在国立一中高中上学时是同班同学。当时三年同班再加上在西安的这段时期，他虽然在西北大学商学系，但常来师专过周末，我们比较熟悉，他比我年长两岁，因此我对他的话是比较重视的。他劝我留在西安，就这样，我听取了他的意见，在西安迎接了解放。

解放后，军管代表接管了学校（学校里也有几个地下党团员）。很快就在学生中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那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姓李的同学是地下团员，他平时和我们来往比较多，也谈论一些时事，比较说得来。在解放后校内的地下党团员公开见面会上他竟然邀请我们去出席，会后还表示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补办一下手续。我觉得自己没有那种经历，怎么可以“冒充”，因此没有办。但从此我却积极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例如去听一些报告。记得我们听的第一个报告是由江

隆基讲“将革命进行到底”（江隆基后来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后来又到北京大学给马寅初当副校长、党委书记）。他主要讲现在要做什么，将来再做什么。除了听报告外也还参加了到医院去慰问扶眉战役下来的伤病员等活动。然后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就被推荐去参加西安市纪念七一、七七群众大会的筹备工作。等大会结束后，告诉我说有一个“暑期青年训练班”，我们可以参加，我们三个就去了。那个学习班共分四个大队，我们被分配在第二大队，队长是张仪容同志——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后来知道他是青年团西安市委的宣传部长）。学习期间也就一个月左右，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主要是听报告，然后小组讨论，加深认识。报告讲的也就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等。当时讲课的人主要是西安市委和西北团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如柯华、丛一平等。在学习快要结束时，张仪容同志和我谈话时忽然说，“学习完后就不要回学校去了吧，和我一起去团市委好吗？”我当时也有一股革命热情，经他这么一动员也就同意了。另外那两个同来的同学则回到学校去了（暑假时，师专被合并到西北大学教育系，而我当时上师专完全是因为它是公费，能管饭吃，对将来当教员并没有太大兴趣）。就这样，我在学习班结束时加入了青年团，然后就跟着张仪容同志到了青年团西安市工作委员会（因为当时还没有开过正式的成立大会，所以只能叫工作委员会）。这样，我的身份就从学生变成了干部，参加工作的时间就是1949年8月。



在团西安市委工作时期
（1949—1952）

到团市委后，我被分配在学生部（或者叫学校工作部）。当时团市委还处于草创时期，没有几个人。学生部只有部长江风一个人。我去了以后他告诉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筹备召开西安市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已经从各校找了一些积极分子组成了筹备委员会，我们要协助他们工作。因此对外也算是筹委会的工作